

當知識份子遭遇革命政黨

• 阮思余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通過張東蓀（1886-1973）這一人物的起落沉浮，戴晴在新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以下簡稱《佛掌》，引用只註頁碼）中對中共這一革命政黨的統治邏輯

做了一個較為詳細的考察。《佛掌》主旨亦如書名所示，張東蓀及其時代完全掌控在中共、尤其是毛澤東這個如來佛手中。由是，我們需要進一步反思的就是，從個人上升到一個階級，反思階級與政黨，即革命政黨與知識份子的緊張關係問題。對於前者，我們需要重點考察其統治邏輯；對於後者，我們需要系統梳理其精神追求。當我們做了這樣的分析之後，不難發現，此間的矛盾與衝突在所難免。畢竟，「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現代版「當知識份子遭遇革命政黨」，依然是一個極為緊張、難以化解的政治難題。從這樣一個視角來審視《佛掌》，從而揭示革命政黨與知識份子的緊張關係，理當頗具反諷與警醒意義。

戴晴的新作《在如來佛掌中》對中共這一革命政黨的統治邏輯做了一個較為詳細的考察。主旨亦如書名所示，張東蓀及其時代完全掌控在中共、尤其是毛澤東這個如來佛手中。

一 革命政黨的統治邏輯

對革命政黨的統治邏輯進行考察，主要就是要考察其與權力的關係。具體來說，也就是要考察其獲

為了更好地坐穩天下，也就需要打壓、排斥其他政治勢力干預政治。如果說，這是所有掌權者的通病的話，那麼，對於中共這個革命政黨而言，這一通病就是重症，甚至是不治之症。

取權力(掌權)、運用權力(治權)與鞏固權力(固權)的態度與行為。

(一) 革命政黨的掌權邏輯：共黨天下

革命政黨的「天下」思想是「共黨天下」。具體來說，就是「打天下，坐天下」；或者說，「坐天下，打天下」。前者的意思是說，天下是我打的，理所當然應該是由我坐天下。後者的意思是說，為了坐天下，我就得拼命去打天下，有時甚至需要不擇手段。為了更好地坐穩天下，也就需要打壓、排斥其他政治勢力干預政治。如果說，這是所有掌權者的通病的話，那麼，對於中共這個革命政黨而言，這一通病就是重症，甚至是不治之症。

就1949年中共建國而言，也存在着一個中共與民主黨派的權力分配問題。在如何對待民主黨派，以及賦予其多大政治空間這一問題上，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兩大巨頭毛澤東與斯大林發生了一些分歧。主要表現在：是否承認民主黨派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勢力而存在，進而向他們開放政治空間？是否吸納他們參與新政權？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發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指出，民盟的解散，意味着中國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不復存在。民盟多數領導人是動搖份子這一事實也表明了中等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因此，「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頁38)。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在覆毛電中強調：中國各在野

黨將長期存在，中共將不得不和他們合作；同時，中共要注意維護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一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為聯合政府。」(頁39)

誠然，毛澤東的論證極不符合歷史事實。更主要的是，這種論述只是為其排斥所有民主黨人參與新政權、分享政治權力尋找一種託詞，只不過這樣的託詞太過於赤裸裸而已。斯大林則從一個更為現實的背景，以及更為遠大的前景來看待這一問題。至於他出於甚麼樣的目的強調民主黨派參政的重要性，則是次要的問題。畢竟，「那時候，共產黨臉一變，民主黨派都不敢說話。」(頁467)問題的悲劇在於，當我們把這樣的時間限定取消掉或者延續至今時，後面的結論依然不變。

(二) 革命政黨的治權邏輯：極權體制

對於任何一個政黨、政治人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只要考察其獲取權力的邏輯，即可預期其運用權力的邏輯。亦即，共黨天下的掌權邏輯內在地決定了其極權體制的治權邏輯。而且，中共的激進革命色彩內在地決定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共所領導的農民戰爭必然產生一個極權體制。其因由至少有二：一是軍事體制統制一切，二是共產國際影響深遠。

就前者而言，軍事體制必然扼殺民主自由。中共直接把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為革命的總司令部。它

有自己的地盤、軍隊和政權。這樣的政黨，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從戰爭年代起，這支未來的共和國幹部骨幹就在一個嚴格的軍事體制下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而在軍事體制下是沒有任何民主可言的。一切都必須服從戰爭，必須實行軍事體制，否則無從保證革命的勝利，以及革命勝利後的管制問題。因此，當時一切重大舉措都像一場又一場戰役。而打仗，除了絕對服從之外，是不允許有別種表達方式的。這就是所謂的軍事民主本身的限度問題。就後者而言，共產國際極力排斥民主自由。從中共的建立、存在而言，中共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的，很長時間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實行嚴格的集中領導，上級對下級有絕對權威。這種組織原則和行為方式，對中共影響深遠^①。

這二者的「完美」結合，也就決定了此後中共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個極權體制。這也就內在地決定了張東蓀及其時代無法逃脫「如來佛掌中」。誠如張君勱所言：「東蓀固視自由民主過生命者，而乃獨欲周旋極權淫威之下斯冀或遂願生平，何殊與虎謀皮？幾何不與格羅彩受制於墨索里尼，愛因斯坦之見逐於希特勒同其命運耶？」（頁479）

（三）革命政黨的固權邏輯：帝王政治

革命政黨共黨天下的掌權邏輯與極權體制的治權邏輯，已經內在地決定了其維繫、鞏固權力的邏輯——只能是帝王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革命政黨的

統治理念，是由其初創期間的主要領袖人物的統治思想所決定的。就中共而言，其崛起的過程已然充分說明，自從毛澤東逐漸掌權以來，中共的統治理念基本上就是由毛澤東所奠定的。毛澤東的帝王思想長期統治中共，也就決定了革命政黨固權邏輯的特徵：革命政黨不可避免地走向帝王政治，或者說是由山寨版走向官方版的帝王政治。

王明在解釋毛澤東為甚麼吹捧秦始皇並把自己比作秦始皇這一問題時，舉了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1948年冬和1949年初，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進入北京時，毛澤東常常向中央委員說：「我在青年時代看小說時，常常想：當皇帝，這可多麼好呵！然而不知道，怎樣才能成為皇帝。現在明白了。我們很快就要進入北京。要知道我們一進入北京，我就成了皇帝，不是嗎？」進入北京以後，他開始廣泛宣傳他是「新條件下的皇帝」。同時，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按照他的命令，在軍隊中專門組織過關於「毛主席是新式的皇帝」這個題目的一些報告^②。

總之，共黨天下、極權體制與帝王政治這「三位一體」構築了革命政黨的權力邏輯基礎。這種權力邏輯是封閉的，也是保守的。誰要是膽敢挑戰這樣的權力基礎，那就等於是自討沒趣，甚至是自找苦吃。可是，偏偏就是有那麼一群不自量力的「偏執狂」，他們就是喜歡對時局秉持異見，堅決與這「三位一體」保持距離，極力捍衛那一片不可侵蝕的精神家園。他們是誰？毫無疑問，他們就是像張東蓀這樣秉持操守、不輕言放棄的知識份子。

共黨天下、極權體制與帝王政治這「三位一體」構築了革命政黨的權力邏輯基礎。誰要是膽敢挑戰這樣的權力基礎，那就等於是自討沒趣，甚至是自找苦吃。

二 知識份子的精神追求

在梳理完革命政黨的權力邏輯之後，我們有必要考察知識份子的精神追求，因為這群「秀才」膽敢對革命政黨的權力邏輯說不。為甚麼他們要說不？那是因為他們有着獨特的精神追求。

(一) 知識份子的權力態度：持正 謹慎

考察知識份子第一重要的應當就是，看其對待權力的態度與行為。知識份子對待權力的態度決定了其精神追求的方方面面。這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其一，淡然漠視分配權力。毛澤東曾經徵求張東蓀對職位安排、待遇要求等方面的意見。張東蓀表示，一切職務不要，也不進中南海，只保留燕京大學教授一職(頁96)。珍視教職甚於權力，這應該是真正的知識份子的真追求。

其二，極力鄙視獻媚權力。《佛掌》一書有幾個細節值得提及：1、鄙視開會拍馬屁的現象。張飴慈記得，爺爺張東蓀甚麼職務都不願承當，在民盟內也不願。每每開會回來，就說一句話：拍馬屁(頁96)。2、堅持報紙應該說自己想說的話。張東蓀後來反思自己的辦報經歷，極為悲憤地痛斥：「我之所以脫離報界就是因為民國十六年以後，報紙完全變為他人的喉舌不能說自己的話了。」(頁170)3、公開反對每次教務會宣讀總理遺訓的政治教化行為。張東蓀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的時候，每次開教務會都要宣讀總理遺訓，張一聽就奪門而出，並說下次再讀遺訓，我就不

來了。在當時這是何等犯忌的事(頁171)！

其三，堅決反對專制權力。《佛掌》有不少筆墨是關於張東蓀反對專制權力的討論：1、反對專制權力沒有黨派分野。「我們歷來不反對國民黨與共產黨，而只反對一黨專政，以為一切罪惡皆由此而生。現在共產黨提議合作是顯然放棄了專政，這真是一件最可慶幸的事了。」(頁246)2、反對專制權力沒有主義之分。「如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當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選擇槍斃與絞刑。」(頁393)3、反對專制權力沒有政府顧忌。司徒雷登校長常說，張東蓀甚麼都好，教書教得好，同事間處得好，只是反對政府這一點有點……(頁356)4、反對專制權力有助於愛國愛民。「沒有一個專制國遇着了外患，而能夠辦到舉國一致的。」「國家是一個民族全體的公器，斷不容哪一個階級來據霸一時，而犧牲其他的自由。」(頁255、328)

(二) 知識份子的思想態度：求得 心安

因為對權力不是熱衷，而是冷靜，進而才可能去堅守其內心世界的價值信條。不同於普羅大眾，知識份子的內心世界更多地具有清醒、理智、獨立，以及秉持操守的一面。首先，這要求知識份子是一個獨立的思想者。「我本身雖始終是一個獨立思想者，但卻有一點特別的地方，就是從來不願在行為方面無故與人立異。」(頁127)其次，這要求知識份子要秉持內心操守，求得自我放心。世人對張東蓀不隨便

知識份子因為對權力不是熱衷，而是冷靜，才能堅守其內心世界的價值信條。不同於普羅大眾，他們的內心世界更多地具有清醒、理智、獨立，以及秉持操守的一面。

參與一個政黨(包括孫中山組織的國民黨)多有微詞，張自己也很清楚：「外間對我的這種不明白我是知道的，但我亦不希望人知。我以為一個人只要行心之所安就夠了。急於向人表白是現代人的一種做法，中國儒家的精神根本不是如此的。」(頁127-28)

(三) 知識份子的人格態度：保持尊嚴

知識份子一方面是訴諸內心世界的自我拷問，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完善理想人格推進自由社會、昌盛國家的成長。首先，國民的人格、健全自由之社會與國運興盛之間具有內在關聯。國家的支柱在於國民的人格。「中國國運之興也，不在有萬能之政府，而在於有健全自由之社會。而健全自由之社會，唯由人民之人格優秀以成之。此優秀之人格，苟政府去其壓制，使社會得以自由競爭，因而自然淘汰，則可養成也。易言之，中國之存亡，唯在人民人格之充實與健全，而此人格則由撤去干涉而自由競爭，即得之矣。於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競爭為最也。」(頁135)。其次，知識份子應該言行一致。這是促進良好的國民人格、進而塑造健全自由的社會、激發國運昌盛的重要一環。誠如張東蓀所言：「讀書人之人格就看其對於本人的言論自己有無尊嚴的保持。」(頁400)張不僅如此立論，而且還身體力行。在政協會議中，除為人民爭自由外，他很少發言，後來非萬不得已亦不說話，不外乎總想不要因為個人言論而影響民盟在國共之間的橋樑地位(頁325)。

(四) 知識份子的求知態度：批判寬容

以上三個方面的精神操守都要通過知識份子對真知的追求表現出來。追求真知需要良知，在一個真知被意識形態所完全操弄的社會，追求真知尤其需要勇氣。張東蓀對馬克思主義對哲學的腐蝕極其反感：「我實在不懂現在中國一班馬迷還要高談哲學，把哲學捧得高高兒的。」「我自信近來有一個發見：就是我發見馬克思派所用的名詞都與我們相同，而其意義都與我們不同。他們所謂哲學不是我們所謂哲學(亦許就正是打倒我們的哲學)」，「自從馬克思主義侵入了哲學界以來，不消說玄學成了問題，即名學亦成了問題。於是整個兒的哲學都成了問題。」「因此我個人以為馬克思主義之突起對於人類思想界是一件絕應注意的事。質言之，即等於一個關。若是不能度過，則不僅哲學從此葬送，即其他高深思想……亦同受影響。」(頁240-42)而且，根據蘇聯的經驗，他認為這種馬氏黨徒危害甚巨。「最可憐的是一班馬氏徒黨，只知篤守其說，不敢變易一字一句，而俄國數千百萬生命遂斷送於此一言之中。」(頁279)

因此，不論是從馬克思主義侵入哲學後的嚴重後果，還是從蘇聯的經驗來看，文化自由主義都是何其重要之舉。「沒有一個學說或思想不可以容忍。只要言之成理都應得加以承忍；只講正統派的思想而置其他思想於不顧，這不是文化的自由主義之精神。」(頁381)張東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對馬氏黨徒毫不留情的批判，如此鞭辟入裏、入木

張東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對馬氏黨徒毫不留情的批判，如此鞭辟入裏、入木三分，不僅在彼時，而且在當下，這樣的批判也總是讓人拍案叫絕、興奮不已。

《在如來佛掌中》告訴我們，知識份子的精神追求愈是強烈，其與革命政黨的關係也就愈來愈疏遠。不僅如此，他們難免會遭到革命政黨的制裁、清算、處決。

三分，不僅在彼時，而且在當下，這樣的批判也總是那麼讓人拍案叫絕、興奮不已。這不僅需要一種道德良知，而且需要的是一種學術風骨。敢於直面建樹不多、甚至阻滯其他學科和思想增進的馬克思主義，敢於與正統派思想叫板，敢於與一班馬氏黨徒唱對台戲，別說在彼情彼景，就是在所謂思想文化日益多元的當下中國，恐怕亦非普通知識份子所願為、所敢為、所能為。

由此，我們從張東蓀身上看到了近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的精神追求與價值關懷，這就是知識份子的個體自主性與反思批判精神。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不依附於任何現實的政治勢力；不依附於任何外在的精神權威；具有獨立的追求真理、價值選擇的能力；依據內心準則而非外在標準自由行動；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幫忙而不幫閒；作為改造社會的獨立批判力量而非御用文人^③。《佛掌》告訴我們，知識份子的這種精神追求愈是強烈，其與革命政黨的關係也就愈來愈疏遠。不僅如此，他們難免會遭到革命政黨的制裁、清算、處決。

三 結語

關於二十世紀戰爭與革命的問題，阿倫特 (Hannah Arendt) 指出，迄今為止，戰爭與革命決定了二十世紀的面貌，彷彿所發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過是在倉促地兌現列寧先前的預言。革命引導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後繼。革命只剩下一個最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對付暴力」^④。中共崛起的過程也正

是在不斷兌現阿倫特的這一論斷。也正是因此，中共日益勃興、直至掌權以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知識份子對中共表現出了相當高漲的熱情、毫不掩飾的稱頌與真心實意的擁護。誠如李洪林所精闢指出的，那時候的知識份子，包括出身豪門的巨富子弟投奔革命，真像出家一樣^⑤。

就連對共產黨一直頗有微詞的儲安平也曾對中共的前途表示讚賞。在1945年12月1日出版的《客觀》第4期〈共產黨的前途〉一文中，儲安平如此寫道：「事實上，共產黨這幾年來對於農民生活的改善，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那種政策政令能夠自上至下貫徹到底，也還有相當成績……在這種意義下，至少就今日中國目前情形來看，共產黨是很有前途的。」^⑥誠然，知識份子對革命政黨的這種好感與接納，其實反映他們對一種新的秩序的尋求與認同。正如張灝所指出的，對意義和秩序的尋求，深深涵藏在由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在現代意識和傳統思想中所表現出來的狂熱興趣之中。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追求還在很大程度上與諸如共產主義和國家主義這樣的政治信仰有關。由於政治信仰提供了逃避意義和秩序危機的庇護所，因而其衰落就暗示着，危機可能存在於一種比轉變中的一代以來任何時候都更為尖銳的形式之中^⑦。

可是，問題的荒謬在於，一廂情願的示愛並不一定能夠換來對方的熱情擁抱。這種單向度的愛，有可能是一種感情被欺騙而懊惱不已的愛。知識份子這種表錯情的歷史，早已成為貽笑大方之舉。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的愛徒拉庫拉巴

爾特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在討論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與希特勒的關係時指出，本世紀所有的偉人，尤其是海德格爾和薩特 (Jean-Paul Sartre)，要麼被希特勒，要麼被斯大林欺騙了。被欺騙的可能，是他們之為偉大的一個實質性方面，因為他們正在等待一個新世界的噴薄而出^⑥。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張東蓀才會感慨：看毛澤東絕對不能看他寫的。他是從來說話不算數的。看他的文章，會讓你覺得是那麼一回事 (頁468)。也正是因為如此，儲安平才會極力批判「黨天下」。

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黨外人士整風座談會上，儲安平發表了他著名的向「老和尚」(毛澤東、周恩來)提意見的「黨天下」思想：「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⑦

在單向度示愛的同時，知識份子還熱切期待共產黨成為一個真正的大黨，成為一個盡早實現憲政民主，而不是延續國民黨一黨專政、改頭不換面的政黨。我們從儲安平的批判中大致可以窺測時人對中共的企盼。儲安平在1945年《客觀》第4期〈共產黨在爭取政權中所走的途徑〉一文中嚴厲批判共產黨：「共產黨應當努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憲政民主，主張軍隊國家化，由種種合法的程序來限制軍隊為國

民黨所利用，提倡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才是根本的做法，才是一個大黨的做法，此亦即我們所以對於在國共會談中，共產黨之只知斤斤計較於自己一黨的地盤與勢力表示失望。」^⑧半個世紀以來，這樣的期待仍然在進行中……相同的是：期待的主題不變；期待的人們失落的心理不變。不同的是：曾經期待的人們一個個以各種形式離我們而去；後世青年學者續發宏論，結果發現，類似一黨專政、憲政民主這樣的語詞原來早已就不是甚麼新鮮的政治名詞……

註釋

①⑤ 戴晴：〈必須和「傳統」決裂——訪李洪林〉，載陶鈺等：《走出現代迷信——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辯論》(香港：三聯書店，1989)，頁124-25；124。

② 王明著，徐小英等譯：《中共50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245-46。

③ 許紀霖：《智者的尊嚴——知識份子與近代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頁3-4。

④ 阿倫特 (Hannah Arendt) 著，陳周旺譯：《論革命》(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頁1。

⑥⑦⑩ 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下冊(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頁21；330；23。

⑦ 張灝著，高力克、王躍譯：《危機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尋求秩序與意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220-21。

⑧ 布魯姆 (Allan Bloom) 著，秦露等譯：《巨人與侏儒：布魯姆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頁31。

半個世紀以來，曾經期待的人們一個個以各種形式離我們而去；後世青年學者續發宏論，結果發現，類似一黨專政、憲政民主這樣的語詞原來早已就不是甚麼新鮮的政治名詞。

阮思余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
管理學院博士候選人